

降大任 著

元遗山论

(增订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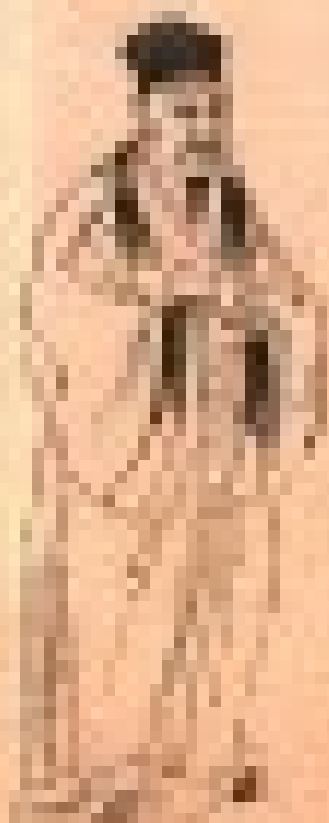
遠

山

花

卷

一



降大任 著

元遗山论

(增订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遗山论 / 降大任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57-1616-0

I. ①元… II. ①降… III. ①元好问 (1190-1257)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0497号

元遗山论 (增订版)

著 者: 降大任

责任编辑: 张继红

特邀编辑: 张勇耀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总编室)

0351-4922203 (印制部)

网 址: <http://www.sjebbs.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45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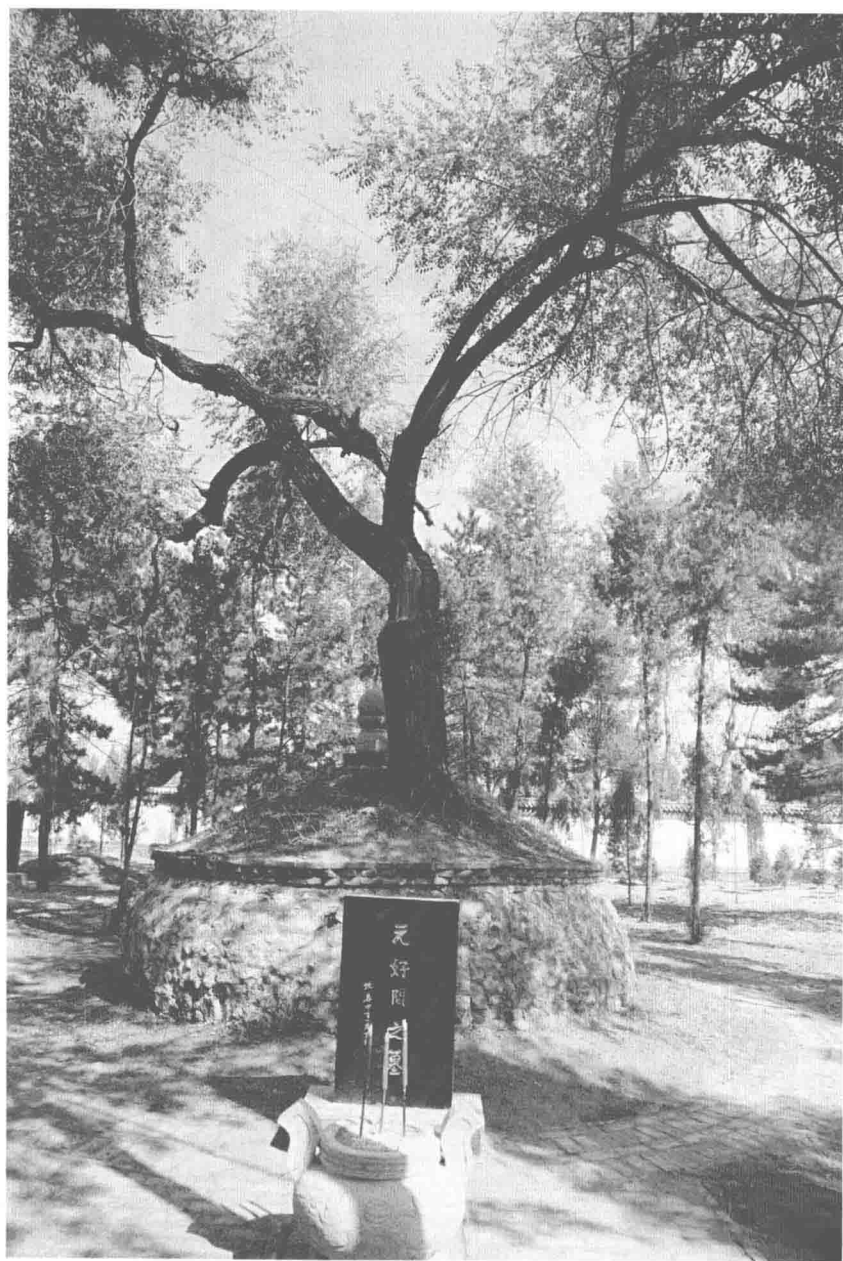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7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616-0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元遗山墓（山西忻州市韩岩村）



野史亭（山西忻州遗山墓园）



元遗山铜像（山西忻州遗山墓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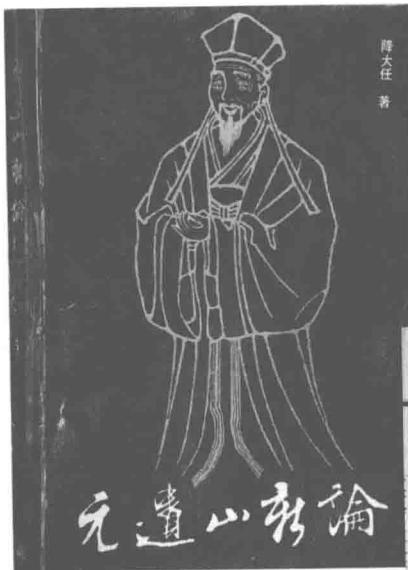
◀ “野史亭”，晚清名臣、山西学者徐继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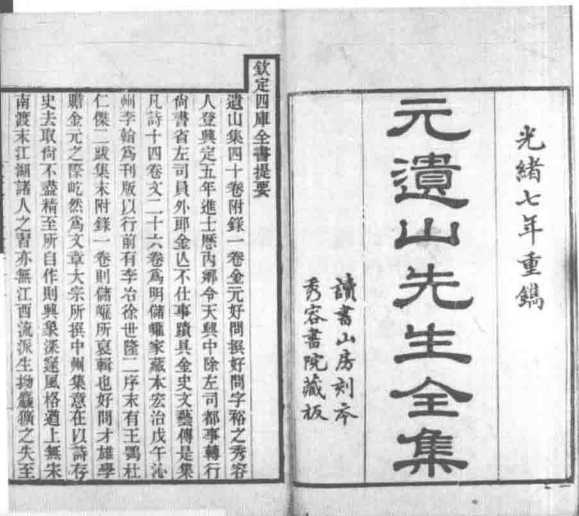
▶ “元墓”，清乾隆年间忻州知州汪本直书



河南内乡元好问展览馆



▲《元遺山新論》原版书影



▲ 光绪七年重鐫《元遺山先生全集》，讀書山房刻本，秀容書院藏板



◀ 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二卷，民國二十四年影印本

再版序

1989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元遗山新论》，是笔者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正规的元好问（遗山）研究的学术性专著。该书发行后引起金元文史研究界好评。1990年5月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短评，199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又发表了金代文学研究者周惠泉先生的专文评价，给予肯定。这些都给了笔者极大的鼓励。这本书算得上1949年以来大陆学界关于元好问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影响所及，似乎为大陆学界继续开展金元文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元好问研究会的成立，笔者供职的《晋阳学刊》开辟了《金元文学与元好问研究》的专栏，全国不少期刊相继发表了不少专论元好问的学术文章，为学界打开了新局面。

笔者这部专著较为全面地以文史哲一体的研究法，对元好问的生平、气节问题、交游及历史文化贡献进行了新的探研，论证了元好问不仅是金元之际中国文学、史学上的巨匠，而且是金元之际中华文化的先进代表。通过剖析元好问这一典型，辨明了评价中国历史人物的所谓气节问题，不能只看其人是否有忠君的乃至以死殉君的结局，而更重要的是考察其人是否忠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之奋斗的大节。史家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评价，不仅应该表彰那些为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敢于慷慨赴死的如岳飞、文天祥式的烈士，还应看到那些不肯为殉君而死，隐忍负谤，坚持弘扬中原先进文化而不懈奋斗，进行如鲁迅称扬的“韧”的战斗的志士。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而元好问就是这样一位抱有弘扬中华民族进步文化，以“国亡史存”而抗争的具有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伟人。这与明末顾炎武所辩亡国与亡天下之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节之士相一致，这也符合先秦进步士人（孔孟）提倡的“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道义原则。因为历史的进步并非只是勇于慷慨就义的英雄人物造就的，而是由包括为民族利益不懈奋争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和全体民众共同缔造的。这也就是笔者致力于元好问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动力的基本立场。以往的元好问研究，多注重元好问在文史方面的成就，而忽视元好问乃是金元之际先进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和代表性人物。但是，似乎学界对此尚未有足够重视，所以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获得不少成果，却至今似乎没有全面的定论，这是笔者略感遗憾之处。此后笔者又发表了若干篇有关的专论，对以往的成果有所补充。所以这次三晋出版社肯于在纸质传媒不景气的条件下再版《元遗山新论》，并加入了笔者的上述几篇专论，改书名为《元遗山论》。这是使我深感欣慰的。所以，这里特别要感谢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先生的积极支持和帮助编校整理此书的张勇耀女士的辛苦付出。

不过，虽然这本专著增订重印值得庆幸，但是笔者不敢自以为是，此书的出版还要待广大学者及同道的严肃评判。倘能得到读书界朋友的严格批评，以匡我不逮，那就更值得额手称庆了。

是为再版序。

降大任

2017年6月10日

初版序

年轻时读元遗山慷慨悲凉的诗句，很受感动，却从未想到要研究元遗山。在读古诗也被指责为吸收封建主义遗毒的年代，读已经是犯忌，哪里有研究的条件和可能。尽管偶尔也看到报刊上发表的零星研究遗山诗歌的文章，但觉得那只是个别老先生才有资格去写的，属于网开一面的特例，年轻学子是不应仿效，去耗费精力的。事实上，凡是致力于古代文化研究事业的人，那时均不免成为大批判矛头指向的明显的或潜在的靶子。在好学上进的青年来说，从古书中讨学问不是正路，而是将被逐步淘汰的旧意识的表现。倘若贸然效尤，很可能变成“封资修的孝子贤孙”，丧失做人的权利。已经被扣上“白专道路”帽子的我，读遗山诗或其他古人著述便是罪状，遑论研究！这种提心吊胆的心理并非无因。“文革”十年，终于看到了现实教训。从古书中讨学问的老先生们统统成了“黑帮”，扫进“历史垃圾堆”。由于涉世浅、年纪轻，我个人虽未受“揪斗”的冲击，保住了大学毕业后的“饭碗”，却始终被指令去划清那永远划不清的同修正主义的界限，背上卸不下那只无形的反动的“黑锅”。

实在说，我并非嗜古如命，单喜欢从古书中讨学问。只是觉得读古诗是一种消遣性的学习，有些兴味而已。不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吸收前人精神遗产

的精华吗？不学习，怎么吸收？从哪里去吸收？这问题，教人实在弄不明白。凡是倒行逆施的东西，终究不能长久，及至“四害”清除，拨乱反正，一切真相大白：不仅读读古诗没有错，而且从事研究更应当得到肯定、称赞。于是，我又想起了元遗山。

这回已不限于欣赏元遗山的诗了，而是下决心去研究一下。当然，这个动机的产生也有客观条件。一是我从1980年10月结束了在西藏日报社的工作，调回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当这里学术刊物的历史编辑（有时也编文学稿件），打算选个业余科研的题目，充实自己；二是元遗山是历来探讨较少的历史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何况他又是我乡里的先贤。研究他既能显出科研工作的地方特色，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义，谁不知道元遗山是历史上金元之际的文坛盟主呢？兴趣和条件，推动我选中了元遗山这个研究题目。

这个工作开始于1983年后半年。首先要干的是读书思考，再陆陆续续写文章；而且从1985年起，还在《晋阳学刊》开辟了“元好问与金元文化研究”专栏，以期在省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视，得到响应。

刊物上的专栏确实发生了影响。两年多来，以山西为主，国内学术界研究元遗山及金元文化已蔚成声势，成果可观，1985年9月在遗山故乡山西忻州市召开全国元遗山研究学术会议便是明证。这是学界诸公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敢掠美，只敢说，个人对推动这一研究的开展尽了微力而已。反过来，再谈自己的研究。

我以往对遗山所知甚少，无非是读了他几首诗，也只知道他著名的《论诗绝句》。要进一步研究，从何下手呢？我采取的方法是了解全貌，突破重点，在这个基础上，选出专题，逐步拓展。要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知道遗山几首诗显然是不行的。研读有关遗山研究的著述文章，我发现谈论诗文及其史学成就者居多，全面评价者很少，而且比较浅略。由于我一向主张研究学问要避熟就生、

人弃我取，所以从全面评价着眼，我打算从弄清有关元遗山的气节问题入手。

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大节有亏，并不等于学问文章便无价值。从事科研，不可只执一端，因人废言。但是，如果大节很坏，那文章学问的价值是不是要贬值？不是说对人的评价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吗？但这讲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能否施诸学问文章的评价呢？我觉得不能死套，既要注意政治与学问文章的区别，也要注意其间微妙的联系。然而，对历史人物如遗山来说，他在金元易代之际的气节问题，却是政治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交织的大节问题，主要还不是学问文章问题。在学术界，称赞遗山学问文章的著述极多，一谈到气节问题，便都像当年我同修正主义划界限一样，引张颌先生的诗来形容，便是：“界线一缕似游丝，苍狗白云多幻姿。”从古及今，对遗山的气节，指责甚多，只有少数学者说过一些“弯弯绕”的回护之词，终究含糊不清。

经过对此问题有关材料的全面考察，我写了一组三篇文章《〈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平议》《且莫枉罪元遗山》，总题为《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目的在为遗山翻案，驳斥加诸遗山气节上的不实之词。

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求真实。然而，求真实谈何容易。文章写作中，我感到遗山真是历史上的大不幸者。生当乱世，出身士大夫阶层，看到了朝代更迭的已成之势。作为亡金遗臣，身背纲常名教的枷锁，要保持住世俗间子臣的“清白”，不能出仕新朝，又要为民族做点好事，保护进步文化，因手中无尺寸之权，不得不借重人家的权势，内心真是痛苦极了，矛盾极了。他临终前，便深知身后要遭人议论，嘱咐弟子立墓碑只题“诗人元遗山之墓”，可见对声名已视之蔑如。世间谁不讲“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功于史却自求无闻，一生苦争却徒罹恶名，这需要何等宽容的襟怀，何等坚毅的气魄，又何等可悲！结果不出所料，从遗山晚年至逝后几百年间，甚至及至今天，都不断有人谴责他的气节问题。那理由是什么，又有什么事实根据呢？无非是“忠君”二字（这

个君还特指亡国昏君金哀宗)。在民族矛盾中,指责者也从来不问遗山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只是一味批评他“境外之交”,周旋新贵,根本不管他实际上为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说在黑暗的封建时代,这种荒谬的评价尚可解释,那么,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还有什么必要重复封建时代的滥调呢?因此,我觉得,这个案非翻不可。记得元初著名诗人刘因有诗叹道:“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这真是慨乎言之。不过,作为一孔之见,这个翻案文章能否做好,我尚不敢固必,愿意多多聆取读者的指教。

解决元遗山气节问题,所涉及的材料是有限度的。遗山气节问题是应当研究的重点之一,并非全面的评价。全面的评价要尽可能详细地掌握有关遗山的全面情况,特别是要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同时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特点,这样才能顾及全貌,不致陷于片面。在重评气节之前,我已经对涉及此事的有关人物做了考察,接着便下决心进一步扩大范围,将遗山一生交往的绝大部分人物的有关材料加以搜集。这个工作技术性强,繁琐而且枯燥,但只能静下心来读书、抄录、整理、考证。这需要阅读遗山现存的全部文字、有关的金元史料和文集,并收集有关的碑刻文字和新发现的材料。这项工作花费了我将近一年的工夫,于是便产生了本书中的《元遗山交游考》《元遗山交游僧道考》和《元遗山亲属考》。这三篇考证性文章,便成为全面评价遗山,进一步研究遗山的最重要的依据,使后来有关的论述建立在可信可靠的基础上;而且,这三篇文章也可以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线索和工具。遗山是一位集大成的人物,可研究的方面与题目很多,我只能选其重要者或他人未涉及者作初步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方便别的研究者,少走弯路,多出成果,所以,我愿意将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向同道者公开,为他们提供参考。

前面提到,以往学术界研究元遗山多谈论诗文和有关史学成就,人所易知,

故而我选择题目的原则是人弃我取。这些题目是：

元遗山对李杜苏黄诗风之继承

元遗山诗歌理论探微

元遗山的哲学思想

元遗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元遗山与太原

前两篇是论诗和诗歌理论的，均系他人研究未及或不够全面者。另一方面，既然要着眼于全面研究，仅仅从一种学科来研究，那是不能奏效的，所以，无论哪一个题目的研究，我都尽可能注意采用文史哲一体的研究法，这也是由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代表元遗山这个特定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只是由于个人学植浅薄，知识面狭隘，愿望虽好，却未必运用得成功。如今，学术界方法论很多很新，使我大有自惭形秽之感。自己口称采用文史哲一体研究法，仍不敢自信，无非是定一个努力方向，借以自慰自勉；何况，这也算不得什么创新，邯郸学步而已。

本书在撰写中曾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材料缺乏，不易寻求。幸有许多师友热情支持帮助，为我排难分忧，特别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张颌先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李裕民教授，吉林大学历史系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辽金文学专家周惠泉先生，原香港中文大学许

① 1233年金亡前，汴京城破后二日（夏历四月二十二日），遗山毅然投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请求保护、资助、任用金廷材士五十四人。以此事“系天下斯文甚重”“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可助楚材实现“致太平之功”（见《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九）。

礼平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真瑜同志，人民日报总编室柯愈春同志，山西忻州地区师专刘泽同志等，或切磋探讨，或提供资料，或指引线索，均助人为乐，勉我奋进，使我不胜铭感。特于此向诸位师友表示衷心谢意。

本书后附有《元遗山年谱要编》及《参考文献目录》，既为己所用，且表明对前辈学人和同道者学术成果之尊重，亦便利他人参考。如有疏误和遗漏，谨祈有识者补正之。

此外，这里抄录个人咏元遗山的几首旧体诗，权作对研治遗山有关学术问题的纪录，表达自己的一点心得和感慨吧。

咏元遗山先生（6首）

皇权正统辨君臣，枉罪遗山有夙因。

青史标名翻旧案，先生不独是诗人！

草木风腥化牧场，哀哀驱口泪沾裳。

累臣心事昭天日，含愤长歌记汴梁。

围城变乱血成河，难挽金源逐逝波。

一纸投书生死重^①，君轻民贵志难磨。

天下斯文重付君，两朝旧事漫纷纭。

① 1234年金亡后，遗山被羁管于山东聊城时作《南冠录引》，文云：“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出死以为民。”又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见《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七）

千秋功罪模糊甚，血泪丰碑自入云。

歌谣慷慨济刚柔，史笔纵横正气遒。

李杜苏黄谁继世，文星朗照见忻州。

从来三晋号多才，改革洪流动地来。

元子遗风争前列^①，今朝振厉越高台。

（诗作于1985年9月忻州全国元好问学术研究会议期间，1987年9月笔者识）